东汉至北朝的墓葬石堂研究

——兼论“宁懋石室”的形制与性质

李嘉妍

内容提要　墓葬石堂经历东汉至北朝由地上转向地下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由墓上祭祀之礼的支撑载体，发展为兼具墓内祭祀意义的石质葬具，并逐渐成为礼制与观念的物质表达。本文综合梳理自东汉至北朝墓葬石堂的考古学材料，从长时段的研究视角指出墓葬石堂的演变趋势，并由此对“宁懋石室”的形制与性质给予判断。

关键词　墓葬石堂　石质棺床　东园秘器　宁懋石室　图像与功能

墓葬石堂之名，在东汉时期便已被人广泛使用，并作为墓上建筑的一部分，成为墓祭的主要场所。其来源可追溯至西汉昭帝时期的“祠堂”，东汉时期，由于豪强大族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儒家讲究的孝道与厚葬之风更加盛行，用石材建筑石祠或石堂便成为一时风尚‹1›。

石堂作为墓葬体系中重要的礼仪性建筑，自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经历魏晋时期“薄葬”礼制的消匿，似乎又在北魏之后重新现于墓葬之中。由于在结构形制与表现形式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最初被发现时，对于这一类石质器物的性质并未作出相对正确的判断。后因多座石堂被发现刻有自名“石堂”或“石室”‹2›，才被进一步确定下来。虽然这一批墓葬内出土的石堂在建筑形制上与东汉墓上石堂较为相似，但在位置与功能上均存在差异，前者更倾向于墓内葬具，用以陈设尸身。目前学界内对于墓内石堂的来源，即此类房形石质葬具，呈现出多种观点，包括认为其与汉代崖洞墓中所建造的石室有关，或与早期的“画像石棺”有一定联系，抑或承袭于四川地区目前可见的房形石棺。亦有认为其与汉代墓上建筑中同名的“石堂”存在密切联系‹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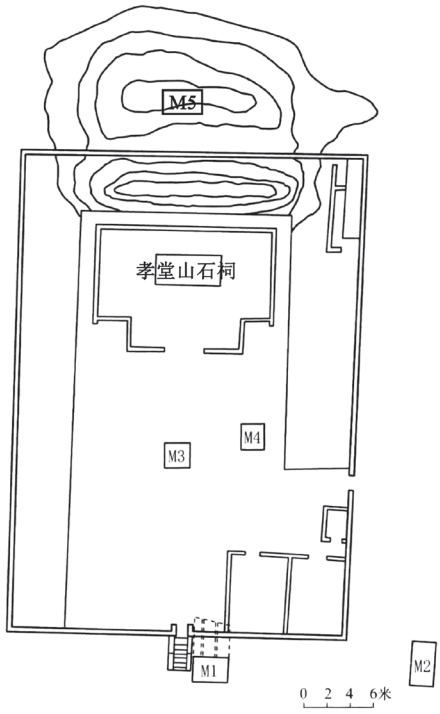
东汉至北朝的墓葬石堂目前可见的考古学材料主要集中在东汉时期与北魏之后，本文试图通过对于

‹1›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0－130页。

‹2›　例如，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出土石质葬具自铭“石堂”；山西大同地区出土的“解兴石室”（现藏北朝艺术研究院，具体发掘材料未发表），门楣墨书文字“造石堂（室）一区之神柩（祠）”。文章可参见：杨军凯、孙福喜《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椁墓》，《考古》2004年第7期，第38－49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第4－33页；张庆捷《北魏石堂石床与壁画》，载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编著《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青铜器 陶瓷器 墓葬壁画》，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8－10页。

‹3›　巫鸿、郑岩《“华化”与“复古”——房形椁的启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年第2期，第1－6页。

〔图一〕**孝堂山石祠保护院平面图**（1981年9月测绘）
采自《孝堂山石祠》图4



这一批物质材料的全面搜集与整理，梳理墓葬石堂整体发展的脉络，追溯其文化来源；并分析墓葬石堂发展流变的可能动因，以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功能性质的守旧或转变，藉此对这一类考古学对象进行更加全面的阐释。值得注意的是，“宁懋石室”作为这一序列中重要的环节，由于其早期发掘出土的情况并不清晰，以致对其性质、功能与位置的争论未有定语‹1›。笔者认为将其纳入整体的时间发展序列去研究这一问题，或能给出相对合理的解答，故在此一并进行讨论。

一　东汉时期的墓上石堂

东汉时期开始流行以石材作为墓上建筑的主要基础，石堂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产物。但由于距今年代较为久远，地表建筑易损毁与移动，现遗存下来的墓上石堂数量并不多，尤其是能够确定原始位置、与墓葬关系的更是屈指可数。分布主要集中在山东、安徽及苏北等青齐周边地区，与《水经注》中所记述的地域较为接近；其中部分石堂为后人拆毁后用以营建墓室而从魏晋墓葬中甄辨出来，另有部分发现时已散佚、后经拼合而成。

从材料来看，目前能够明确发掘情况的墓葬石堂并不多，虽有等级规制上的差异，但基本可窥见石堂在东汉时期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山东济南的孝堂山石祠‹2›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仍存于地表的最早的东汉石堂，据其周边墓葬的分布情况而言，应为一处确定的家族墓地。与孝堂山石祠有直接关系的被认为是M5，位于石祠北侧（后）的封土之下，其他四座墓沿山势分两列位于石祠之前，朝向东南，且相互之间有早晚关系，由东南至西北年代依次前推，并列的两座墓则时代相近。这一排列组合的方式〔图一〕，似有在墓地内遵循宗庙昭穆之礼的意味。石祠内可见供案石，置于室内正中靠向后壁，足见其祭享之意〔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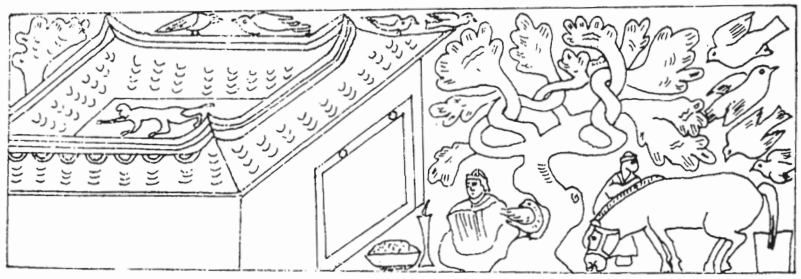
‹1›　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奥村伊九良、富田幸次郎等对于“宁懋石室”功能、性质的判断即出现争议。其后，郭玉堂又在《时地记》中将“宁懋石室”称为“石制阴宅”。郭建邦虽对“宁懋石室”的名称进行规定，却在性质和功能的判定上颇显暧昧。巫鸿在对北朝墓葬材料的反思中，明确改变自己原本的观点论断，转而同意郑岩的说法，认为“宁懋石室”应为葬具而非祠堂。林圣智则坚持认为“宁懋石室”应当为现存的唯一一座南北朝时期的祠堂遗物。Wu Hung, “A Cas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House-shaped Sarcophagi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Orientations* Vol.33, No.5 2002, pp.34-41；林圣智《北魏宁懋石室的图像与功能》，《美术史研究集刊》2005年第18期，第10—13、54页；邹清泉《汉魏南北朝孝子画像的发现与研究》，《美术学报》2014年第1期，第54—65页。

‹2›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蒋英炬、杨爱国、信立祥、吴文祺著《孝堂山石祠》，文物出版社，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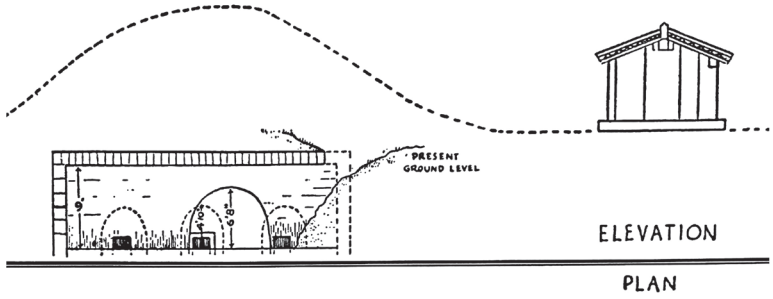
武氏三祠‹1›是另一处被确认为家族墓地的墓上建筑，时代较孝堂山略晚，内均设供案石，应同为祭祀所陈。除石堂外，墓地还发现有完整的东西两阙及石狮，列于墓地入口处，属汉墓常见的配套建筑组合，即石阙、石兽、石庙（堂）、石碑等。东汉桓灵或更晚时期的朱鲔石室‹2›，在石室形制与陈列顺序上也基本相同〔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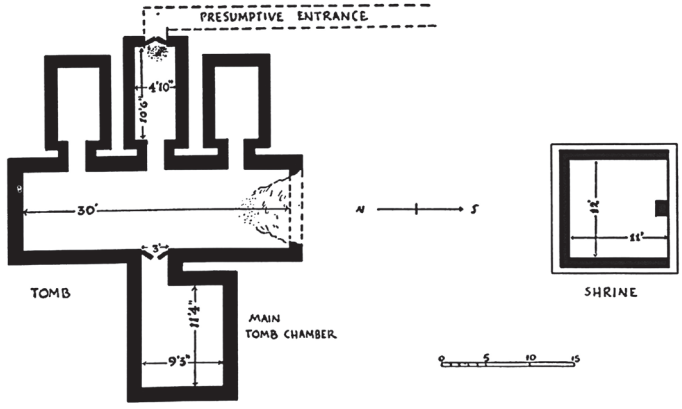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似乎还存在一类石堂，其所设位置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安徽宿县褚兰汉墓石祠‹4›、洪山汉代画像石祠‹5›以及江苏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石祠‹6›均属此类〔图四〕，规模较小，其主人均被推测为四百石或以下的普通官吏或中小地主。这一类可被称为“中小型”石堂的墓上建筑，往往呈现出半埋于封土之下的状态，两侧一般会残存较低的矮墙，即所谓的“墓垣”。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墓垣基本围绕封土而建，以规划墓葬范围；同时在形制上多将矮墙顶部雕成瓦垄，滴头刻云纹圆瓦当，连檐刻水波纹，墙面则饰竖行凿齿纹，墙基填菱形纹，以此模仿木制建筑的墓园垣墙。祠内雕刻或前置杯、勺、盘、食案等器物，亦属祭祀之礼。

〔图二〕**孝堂山小石祠祠堂祭祀画像石摹本**
采自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图四三 文物出版社，2000年



〔图三〕**费慰梅绘石室与墓室关系图**
采自*A Structural Key to Han Mural Art*‹3›, *Fig. 15.*
Plan and elevation of the tomb and shrine of Chu Wei, Chin-hsiang





‹1›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

‹2› 蒋英炬、杨爱国、蒋群《朱鲔石室》，文物出版社，2015年。

‹3› 前揭蒋英炬、杨爱国、蒋群《朱鲔石室》，第11页。

‹4› 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第515－549页。

‹5› 淮北市文物局《安徽省淮北市发现汉代画像石祠》，《东南文化》2019年第6期，第19－25页。

‹6› 尤振尧《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象石墓》，《考古》1981年第2期，第137－150页。

〔图四〕汉代小石堂图像题材组合
1. 山东微山两城永和四年铭文题记画像　2. 洪山汉代画像石祠C1复原图

1　　2

梳理墓葬与墓上石堂相对位置的关系，不难发现对于大型家族墓地而言，石堂、墓葬的排序位置应当均是有意的遵循了某种规制，以此来规划家族墓地的长幼关系与尊卑秩序；而对于“中小型”石堂而言，两者的关系则呈现出一种逐渐接近、甚至合并的趋势，即墓室与墓上石堂的直线距离逐渐接近，高差缩小。直至根据图像线刻风格、可确定年代在东汉末期左右的白集画像石墓石祠，其墓室为土墩墓形制，平地起坟。该墓的地下墓室与地面石堂之间的水平位置几乎持平、距离相近，有连接之可能而同属统一空间，这或许能够被看作为地下石堂是由地上石堂转变而来的重要证据之一。

东汉墓上所立的石堂，在形制规模上或各有不同，这应与祠主本人或其家族后人的官职、财力等因素有关，但这并不影响石堂在图像题材与配置组合上达成一致。两侧壁刻绘表现世俗生活的庖厨、宴饮，象征墓主身份的出行、车骑；山墙或隔梁顶部刻绘仙界重诸神的东王公、西王母，历史传说的伏羲、女娲；以线格分割且出现多次的历史旧事、孝子故事及孔门弟子等，都是东汉石堂在构筑图像组合中不可或缺的主题，这几类题材被固定在石堂各个壁面，甚至隔梁石处。墓主人画像题材也是各个石堂内绝不缺少的内容，基本均以“楼阁人物”的方式出现在正壁或后龛正壁之上。不论是规模较大的武氏三祠，还是中下层官吏的一进式单开间祠堂均见墓主人题材，壁面前设供案石，上置或雕刻耳杯、勺、盘等食具，以示后人拜谒之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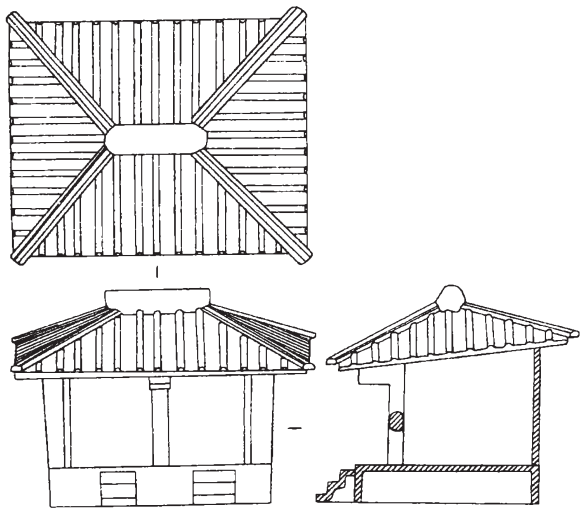
墓葬石堂大量出现，成为墓前可见的主体地上建筑，这与东汉当时“上墓”的礼俗密切相关。豪强大族为团结家族势力而推行的“祭祀祠堂”等手段，被上层统治者所采纳，以东汉明帝为代表，改革陵寝制度，于陵墓之前建筑寝殿或石殿，供朝拜祭祀之用。唐宋以后的献殿（享堂）或上宫，亦是由此发展而来[1]，成为墓上祭祀的主体空间，兼具礼奠之意。

综上可见，以石堂为代表的石制墓上建筑滥觞于东汉时期，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自身特有的表达系统，以传达后人对先者的祭拜之祀。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底层民众，均流行“墓祭”的礼习风俗，并以石殿或石堂作为祭祀场所，行“上陵之礼”。对于社会群体而言，虽然石堂在形制的建构选择、图像的表

‹1›　前揭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39—42页。

现方式上均受限于祠主或墓主等级身份、官职财力的高低，但其所具有的基本元素与内核意涵无疑是相同的。正壁设墓主人画像，前置供案、祭品，两壁绘制车骑出行、孝子故事的组合传统，无疑是石堂墓上祭祀体系的核心要素，在东汉时期被正式确定下来，并逐渐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地文化的礼制传统与核心内容。

〔图五〕山东临淄金岭镇齐炀王刘石墓出土泥质灰陶享堂 （M1:131）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内石堂与石棺床

魏晋时期，政权统治者对于墓葬及墓上建筑都采取了抑制、甚至放弃的态度。魏文帝曾于黄初三年公开诏毁曹操高陵的地上殿屋，并称“古不墓祭”。至此，东汉时期风靡一时的墓上建筑不再常见，石堂等石制建筑组合也因政治原因被取缔。

直至北魏时期，这一情况被彻底改变，墓室石堂大量出现。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附近就出土了一批以石堂作为葬具的墓葬，其基本形制与东汉时期的墓上石堂几乎相同，多为悬山式堂顶，前设立柱或立壁中部开间。北魏太安四年(458)的解兴石室[1]在形制上较为特殊，形制更类似于箱型，不似石堂之态，但其石壁上刻有题记“解兴鹰、门人世夫妻王(亡)，造石堂(室)一区之神柩(祠)，故祭之”，以此可确定名称。墓内的石堂外，多数都会摆放供案或木桌一类的器物，朝向石堂开间方向，上置杯、罐等饮食器或酒器，石堂内置棺床以停墓主尸身，宋绍祖夫妇墓[2]和南郊区沙岭建材市场北魏夫妻合葬石椁墓[3]等均是如此。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墓内石堂或具有与东汉时期墓上石堂相同的祭祀功能。

将墓上祭祀移入地下，这一做法并不是从北魏时期开始的，东汉年间已见端倪，只不过并不是将墓上石堂的形制直接放入墓室，成为葬具的一部分。汉代室墓便存在模仿地面建筑，以墓前室为前堂，兼具享祭死者的功能[4]。而同样，在墓中祭祀墓主的葬俗在鲜卑旧习中也存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扎赉诺尔墓群中已出现头宽足窄的葬具，棺首前安放牛、马、羊等殉牲，这种葬俗一直延续至平城时期[5]。

此外，东汉时期的山东临淄金岭镇齐炀王刘石墓见泥质灰陶享堂模型〔图五〕，庞殿顶、三面墙壁，

‹1›　前揭张庆捷《北魏石堂石床与壁画》，第8—10页。

‹2›　刘俊喜、张志忠、左雁《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页19—39。

‹3›　吕汉富《大同沙岭建材市场东发现北魏夫妻合葬石椁墓》，《山西青年报》2018年4月19日第16版。

‹4›　李锦山《鲁南汉画像石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16页。武利华《汉代装饰墓室的“墓室祠堂”及其意义——以河南、四川汉代装饰墓葬为例》，载中国汉画学会《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4页。

‹5›　林圣智《图像与装饰：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9年，第71页。

正面敞口，檐下正中间由一立柱支撑[1]。内蒙古包头南郊召湾汉墓也出土过类似于石堂的明器[2]，但由于其形制与东汉常见的石堂并不一致，且只有两侧壁与中心立柱，更倾向于为某一类建筑明器的附属配件。据此可见，北魏时期墓内石堂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可能从某种程度受到了此种模型明器的影响。

而对于墓内石堂葬具与四川地区房形椁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论证。对比现有的考古学材料[3]，两者之间在形制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功能使用上似乎也并不全然相同。以成都天迴山崖墓[4]为例，该墓群M3右二室所见石棺，顶部棺盖呈屋顶状，棺面四侧雕刻图像。与汉代墓上石堂相比，整体形制并不一致，非建筑，而仅为葬具；线刻题材有重叠，但并不体现完整组合。因此，这一类房形石椁应是边缘地区在受到中原汉地文化影响之后，与本地丧葬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否能够将其作为北魏以来墓内石堂发展的原型，仍待斟酌。

因此，北魏时期类似于东汉墓上石堂形制的石堂，或可称更倾向于葬具的这一类石堂，其重新出现在墓葬之中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既受到了魏晋以来统治者政治决策的影响，也与墓上石堂设立位置的改变及其在墓室之中的发展趋势有关，更与北魏鲜卑旧俗流行的墓祭之风密切相关。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墓内石堂不仅在形制上与墓上石堂极为相似，直接承袭而来，而且在功能作用上应当也未曾改变。在作为葬具承担停放墓主尸身的同时，石堂仍是后人用以实现对先者祭祀崇拜的载体。

平城时代的北魏中高层贵族在使用这一类墓内石堂时，虽然借用了东汉时期墓上石堂的形制结构以及刻绘图像的题材，却并不完全按照东汉时期的构图模式。在墓主人画像、出行仪仗等描绘现世生活的图像题材上，与东汉时期的风格特征截然不同，应是在鲜卑自身文化影响下而产生、对于中原汉地文化的一种继承沿袭，直接来源当为东汉时期的墓上石堂建筑。

除此之外，北魏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系列石质棺床，与石堂形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两者应是并行的两种墓内葬具形式。

除绘制或线刻图案简单，与这一时期墓葬装饰题材较类似的不设围屏或围屏未设置双阙的石棺床，洛阳地区在这一时期出土了一批带有双门阙及前墙的围屏石棺床，形制相对统一，围屏图像题材也基本一致，应为定制，具有强烈的东汉文化风格。以首都博物馆的围屏石棺床[5]为例，除前壁外四周围屏，

‹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第97—121页。

‹2› 魏坚、张海斌《第四章 召湾90-97号墓葬》，载魏坚编著《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53—265页；张海斌、高学锋《召湾和边墙壕清理的四座汉墓》，《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第92—101、66页。

‹3› 目前四川地区可见房形石椁的墓葬如下：成都天迴山崖墓、泰兴镇凉水村崖墓、乐山市沱沟嘴东汉张君墓、内江市中区红缨东汉崖墓和郫县东汉砖墓。齐香钧《北朝至隋墓葬出土石堂再研究》，《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68—73页；陈云洪、张俞新、王波《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9期，第36—56页；胡学元、杨翼《四川乐山市沱沟嘴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第1期，第40—50页；雷建金、曾健《内江市中区红缨东汉崖墓》，《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第40—42页；梁文骏《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的石棺画象》，《考古》1979年第6期，第495—503页。

‹4› 刘志远《成都天迴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87—103页。

‹5› 滕磊《一件海外回流石棺床之我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第22—32页。

两侧围屏分绘鞍马、牛车出行，后壁两边绘制孝子郭巨故事，正中则绘制人物和家居。前壁两侧至双阙及矮墙，其上绘制人物图，形态略似武士、侍从。卢芹斋旧藏的围屏石床[1]也呈现出一致的特征，只是将后壁表现世俗生活的家居图等，全部换成孝子故事，依次展开，排列顺序与文献记载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一题材的选择与设置，和东汉时期墓上石堂的图像如出一辙。而石棺床前壁所设置的石阙与矮墙，与墓上建筑组合中的墓阙与墓垣相似，相互对应，或受到影响而产生，由墓上建筑发展而来。这一类双阙屏风石棺床，将以石堂为代表的墓上建筑形制整体附加于葬具石棺床之上，亦是地上石堂发展进入地下墓室的另一种表现。与墓内石堂不同的是，由河南安阳固岸墓地M57[2]出土情况可知，石棺床前似乎并未置类似供案一类的器物，说明石棺床是被作为一种葬具而在墓葬中使用的，与墓内石堂所具有的祭祀功能有所不同，仅仅是尸身置放之所。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其只借鉴了墓上建筑的形制作用于棺床之上，或者石棺床已是墓内石堂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成为墓内的一种葬具形式。

但是，并非所有的双阙屏风石棺床均呈现出与墓上石堂相似的图像题材。部件分别藏于德国科隆东方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及弗利尔美术馆可复原的一件围屏石棺床[3]则与上述绘制孝子题材的石床在图像的选择上截然不同，而在形制上却又极其相似。这件石棺床的双阙上浅浮雕两列仪仗队，左右首位均戴被帽，身着联珠纹长袍，另有殿后饰马，同时侧面还有祆教火坛与祭司的图像，被认为应是北齐九州大萨宝一类的人物，即是在中央行政官吏下对西胡之民进行行政教管理的“萨宝”[4]。

虽然与洛阳地区出土的石棺床在题材上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但是在形制上前壁双阙、矮墙均是中原地区石棺床的特征；围屏后壁上雕刻有以北齐样式的建筑组合及葡萄园宴饮题材的图像，这一主题是中原汉地墓葬多见的墓主人家居宴饮题材的变形与发展，因此画面的整体场景应属于中原地区。但图像中所表现的人物及其服饰、乘骑等则均采用粟特风格呈现[5]。此种在画面主题上借鉴汉文化系统，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则以粟特风格表现的文化冲突方式也应与政治因素不无关系。作为中原政治体系下拥有特殊政治身份的人物，“萨宝”具有极为强烈的政权象征意涵，双阙屏风石棺床作为中原汉地文化的代表，或不是其个人选择所能决定，而是基于身份做出的政治选择。但他也在棺床图像选择了与传统中原孝子题材截然不同的组合，以表达自身的文化倾向与群体认同。

‹1› 徐津《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孝子石棺床的复原和孝子图像研究》，载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19—140页。

‹2› 潘伟斌、聂凡《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考古发掘收获》，《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第19—23页；潘伟斌、聂凡、裴涛《河南安阳固岸墓地北朝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及认识》，《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7日第5版。

‹3› 贺西林《北朝画像石葬具的发现与研究》，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41—376页。

‹4› 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读书・生活・新知 三联书店，2004年，第33—62页。

‹5› 前揭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43—46页。

诚然，双阙围屏石床也绝不仅仅是文化冲突的体现，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墓主个人的文化背景。例如，祆教教义要求尸身不能与泥土直接接触[1]，这与石棺床的使用可相对应；前壁的墓阙可与象征祆教胡天的天阙互用共通[2]。由此可见，该石棺床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政治要求、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冲突下的产物，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的北齐围屏石棺床[3]也在图像与形制上呈现出与上述石棺床极为相似的特征，或属这一时期的同一类社会群体。

北朝至隋代的一段时间内，一部分粟特裔贵族的墓葬之中也出现石堂、石棺床一类的石质器物。其中北周史君墓与隋代虞弘墓所出土的石质葬具在形制上与东汉的石堂更为接近。北周史君墓出土的石堂门楣直接阴刻篆书“大周凉州萨保史君石堂”字样，直接将石质葬具定名为“石堂”，与东汉时期墓上建筑石堂似出同源；并以汉文题铭“父造石堂一区，刊碑墓道，永播”[4]。“刊碑墓道”的做法应可溯源至汉代墓上建筑中神道两侧或前部立碑的组合，即类似于武氏祠的建筑组合。但在墓内并未找到关于“刊碑”之类的碑文，且墓葬并不存在盗掘等情况，或可判定所谓的“刊碑”并未遗失。发掘报告提出，刊碑即指在石堂正南石门门楣上用粟特文与汉文两种文字所模仿北朝中原地区而写的类似于墓志的铭文，这一点当是可信的。这种既有刻意模仿东汉传统的题铭，却又并未采用完整形制的做法，其背后所体现的是这一类粟特裔贵族在葬制选择上观念的冲突和妥协。史君石堂在文字书写上极其不规范，但是在遣词造句、书写内容和格式上都与同时代墓志较为相似[5]，可见营造者应该是在模仿汉地墓葬的传统。由此，“刊碑墓道”也应是模仿汉地风格而来。东汉时期，大量墓上石堂造于地面，多数均刻铭文，如山东微山出土的多件石堂构件，刻有类似“永和元年太岁在丙子十二月廿六日□□□王成母立食堂”“思念父母悲哀乃弟兄冢作小食堂传孙子”[6]等铭文，这与史君石堂上的汉文题铭有异曲同工之妙，立石堂以表后人孝顺、思念之意，传之子孙。北魏时期的解兴石室亦是如此。“永播”二字更应是模仿汉代传统而题，墓内石堂埋于地下，显然并非生者所见。“永播”以传祭祀之意本应是东汉墓上石堂常用的语词，可见史君石堂或只是直接借鉴而来加以铭记而已。由此，史君石堂无疑是东汉时期墓上石堂墓内的进一步发展，其营造者在使用这一套器物时或许并非真正理解，只是单纯地模仿与继承，才造成对于铭文的误读。

但在石堂图像题材的运用上，史君石堂明显没有全面采用东汉石堂的主题或雕刻手法，采取浅浮雕，在使用传统的墓主人宴饮、出行等母题的基础上，以粟特文化的图像题材为主要表现形式，显示出

‹1›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88页。

‹2› 前揭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43页。

‹3› Annette L. Juliano and Judith A. Lerner, “Cultural Crossroads: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Entertainers on the Miho Funerary Couch,” *Orientations* Vol. 28. No. 9. 1997.

‹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第4—33页。

‹5› 杨军凯《北周史君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92—202页。

‹6› 马汉国《微山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6—39页。

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结合。前壁石门的设置，虽未打开，应也是模仿石堂而设，堂内设置石榻放置尸身，也与东汉石堂墓主神位的居所有关。

隋代虞弘墓出土的石堂[1]情况相似。底部有一较高的底座，并置石狮头座垫，这与东汉石堂前置石狮的传统有相似之处，将墓上建筑的组合压缩至墓内，与双阙屏风石棺床在围屏上使用墓阙、墓垣的做法相一致。北齐鲜卑裔贵族厍狄迴洛墓[2]也出土有木制的石堂类建筑，或内置木棺作为葬具而使用。

围屏石棺床的传统则一直从北朝延续至隋，先后发掘的北周安伽墓[3]、康业墓[4]均使用石棺床，形制类似于南方地区常出的围屏石榻，与双阙石棺床相比，缺少前壁的阙楼与矮墙部分。隋代可见的天水石马坪围屏石棺床[5]，也应属此类。北周婆罗门后裔李诞墓[6]所用葬具为石棺，非石棺床，绘制图像也和前者有较大不同，文化来源或与“东园秘器”有关，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总体而言，北魏至北朝、隋时的墓内石堂或石棺床应该都是东汉墓上以石堂为代表的墓上建筑在地下的一种转化。由《水经注》所载可知东汉时期的墓上建筑在北魏时期仍清晰可见，甚至在北魏文明太后陵上仍设永固堂[7]，足见北魏统治者对于这一套礼制的推崇。且东汉末期，墓上石堂的地面位置便有向封土、墓室靠近的趋势，多半埋于封土之中。统治者的汉化政策与现实建制的影响，共同推动了墓内石堂的出现。北魏平城时代，墓内石堂外置供案，可见石堂作为葬具，仍与东汉时期相同，有祭祀之用，以新发现的山西大同北魏贾宝墓〔图六〕为代表[8]；迁都洛阳后，石堂逐渐转变为葬具的一种形式，与石棺床一起继承了东汉墓上建筑的部分建制，并结合多种不同文化传统，产生新的变化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或有非汉文化传统使用者的直接模仿与误解错读。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第27－52页；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隋代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

‹2› 王克林《北齐厍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第377－402页。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第28－35页。

‹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第14－35页。

‹5› 张卉英《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第46－54页。

‹6› 程林泉《西安北周李诞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西北大学考古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著《西部考古（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400页。

‹7› 《水经注》载：“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趺，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可见，文明太皇太后陵前设堂、屏风，镌石为碑兽，并植树。（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312页。

‹8› 山西大同北魏平城时代贾宝墓墓室中部设一前廊后堂的单间房形木堂，堂内置木榻，墓主尸身列其上。前廊地面摆放漆盘、漆碗、漆耳杯等饮食器，内置羊肩胛骨等。石碑置于中央，碑文一面正对墓道；南侧为石灯，东侧为一木镇墓兽（侯晓刚、张海蛟《山西大同北魏贾宝墓发掘简报》，《文物》2021年第6期，第23－37页）。整体场景似在营造墓内祭祀的氛围，石碑与镇墓兽的设置亦在模仿地面的墓上建筑，当属墓葬石堂在北魏平城时期由地上转向地下过渡阶段的重要标志。该墓正式的考古发掘资料刊布于本文成稿之后，进一步为本文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图六〕山西大同北魏贾宝墓墓室 （由北向南摄）

三 “东园秘器”的文化来源

两汉时期，皇帝即诏赐“东园秘器”给臣子或宠幸之人，以为他们的寿寝，《汉书》《后汉书》列侯、重臣传记中多有记载。三国至西晋时期，虽时局动荡，这一传统却仍有保留。北魏拓拔氏建国后，在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下，沿袭了汉地下设“东园”及诏赐“东园秘器”的这一礼制‹1›。

同一时期的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了大批孝子石棺、龙虎升仙石棺等，由于发掘资料的缺乏，暂无法判定其归属者。由目前可见的元谧石棺及其墓志‹2›可确定，石棺即为诏赐的“东园秘器”‹3›。史料记载北朝诸代皇室赐“东园秘器”（即“秘器”）共计40余件‹4›。

北魏时期，统治者虽然大量使用“东园秘器”以赐葬，并模仿东汉设“东园官署”以专门制作、管理此类事物，但所用的葬具似乎与东汉时期并不相同。“秘器”常见的图像主题中已基本不见日月、连壁等，取而代之的是东汉时期墓室内、墓上石堂内常见的孝子题材，以及南北朝时期由外来文化传入的带有佛教色彩或本土道教色彩的图像。以元谧石棺‹5›为例，其石棺前后挡一侧见中亚式尖拱门，门楣饰双凤头与忍冬纹，线刻摩尼宝珠等，另一侧则为一巨大畏兽，上下描绘山林。左、右两侧棺板自上而下则分别是是汉地传统的青龙、白虎，孝子图画及山石草木。其他出土的龙虎、升仙石棺在主题上与元谧石棺基本相似，添附或减缺，基本以龙虎、升仙为主，形制技法均似同出一处。通过石棺之间题材组合的异同，大致可知龙虎、升仙、孝子等题材出现较早，应是承自东汉石堂传统的图像主题，在表现手法上源于晋及南朝早期的绘画传统；而赋有佛教色彩的忍冬、畏兽等题材，则应该是外来宗教文化信仰传入后进一步发

‹1› 邹清泉《北魏墓室所见孝子画像与“东园”探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3期，第16—39页。

‹2› 亦有学者提出元谧石棺非属元谧，认为两者在出土时组合信息已缺失，可能为后人附会。如徐津、马晓阳就根据棺上榜题文字书风、孝子故事选择，进一步提出元谧石棺应为元融所有。虽然对于石棺所属多有质疑，但是对于这一类石棺应为“东园秘器”的观点确当无疑。贺西林《道德与信仰——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画像石棺相关问题的再探讨》，《美术研究》2020年第4期，第30—32、41—51页。

‹3› 《魏书》卷二一上《赵郡王》有载：“（元谧）正光四年薨。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赠帛五百匹。”由此可见，元谧为皇帝诏赐“东园秘器”，即可确定“东园秘器”之形制。《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列传第九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544页。

‹4› 前揭邹清泉《北魏墓室所见孝子画像与“东园”探考》，第34—39页；祝越《东园秘器试考》，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第11—14页。

‹5› 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51-280; 黑田彰《鍍金孝子伝石棺続貂——ミネアポリス美術館蔵北魏石棺について》，载其所撰《孝子伝図の研究》，汲古书院，2007年，第383—414页。

展的产物。

“东园秘器”作为统治者官方用以诏赐生前身居要职或具有某种特殊身份的政治群体[1]，具有其特殊的政治内涵。由于这一类葬具均出自官署制所，结构形制、图像内容所代表的是统治者的意志，并遵循一定规制，不得随意更改。因此，可以看到，目前出土的石棺在线刻手法、图像选择上都极为规整。采用具有东汉风格的画像题材，是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汉化”政策在墓葬制度改革上的具体表现。相比于东汉时期对于孝子、列女一类图像的使用，北魏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或许与大量见于地面的墓上石堂有关。这一点，从孝堂山石祠壁面的题记之间，便可窥见一斑。而与此同时，北魏在这一种图像主题上的继承，亦是一种对东汉时期墓葬石堂图像主题的重构。一系列成序的孝子故事在葬具上呈现，足可见统治者对于“孝道”的推行，对于中原核心文化的推崇。

以是，用汉地风格的“东园秘器”来赏重臣贵戚，应当是诏葬中的“最高荣誉”，远高于传统鲜卑葬式的礼俗。能够使用这一套石棺组合的政治人群，也不被允许随意改变其形制或图像，必须依规制而行，非常人所能用。

北魏分裂后，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所记赐葬“东园秘器”者数量急剧减少，其原因应与统治者政策有密切联系，无论是东魏的统治阶级高欢，或者是西魏的统治阶级宇文泰，都强烈地反对文帝所持的“汉化”政策，甚至有倒退以复“胡制”的趋势，主张汉、鲜分治，以六镇鲜卑的兵力统治汉族[2]，故，放弃“东园秘器”这一套墓葬礼制也不足为奇。

目前能够确定为北朝时期并明确使用者身份的出土石棺屈指可数，以北周婆罗门后裔李诞[3]与张氏家族张政[4]为代表。李诞墓所用石棺与元谧石棺在图像题材、内容布局及线刻手法上如出一辙，似出同源。根据墓志记载，李诞生前为“婆罗门种”领民酋长，而张猥长子张政则屡立战功，终以“镇远将军”入葬。以此可知两者应均为具有特殊身份的政治人物，被诏赐此类葬具或是统治者对其社会等级、所为之事的认可与表彰。

北齐至今似乎未能有确定身份的此类石棺出土，但据文献记应当也存在这一做法。山东青州傅家庄所发现的画像石室墓[5]，由于破坏严重，已不知其具体形制，但据当时的发掘情况而言，应当为墓葬石室，而非石棺床或其他。从形制上来说，北齐益都石室与北周时期所发现的石棺并不相同，但通过石室图像主题及雕刻手法与后者的对比，不难发现，两者在图像的选择及线刻技法上兼具异曲同工之处，应代表同样的政治意涵，具有相同的文化渊源，即直接承袭于北魏时期的“东园秘器”而来，至隋唐时期仍

‹1› 前揭邹清泉《北魏墓室所见孝子画像与“东园”探考》，第16—39页。

‹2›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14页。

‹3› 前揭程林泉《西安北周李诞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91—400页。

‹4› 杨军凯、辛龙、郭永淇《西安北周张氏家族墓清理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13年8月2日第8版。

‹5› 青州市博物馆编《山东青州傅家庄北齐线刻画像石》，齐鲁书社，2014年；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第49—54页；夏名采《青州傅家北齐线刻画像补遗》，《文物》2001年第5期，第92—93页。

〔图七〕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宁懋石室”
采自曾布川宽、冈田健《世界美术大全集》第3卷[1]，东京：小学馆，2000年，页91

有因被赐葬而使用的特殊人士。

由此可见，史称“东园秘器”的石棺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内所用的石堂、石棺床，虽均为石质葬具或兼葬具之用，其上图像题材亦有相似之处，但从政治意义而言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上层统治者政治取向的直接体现，图像题材、线刻手法及布局构图都无一不循礼制，直接承袭东汉文化而来，或同出于官方机构，统一定制；而石堂、石棺床则在继承东汉传统的基础上，个体之间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同一母题下各有发挥，依据不同的使用群体而呈现出多样的特征。

四　浅谈“宁懋石室”

“宁懋石室”〔图七〕自现世时便受到学界内多数学者的关注，讨论与争议也随着而来。尤其是对于其出土位置以及功能性质的认识，目前依然无明确定论。针对“宁懋石室”出土于地上或是地下，为祠堂还是葬具的问题，成为近些年研究的重点。笔者无意在此给出臧否，但对于“宁懋石室”具体位置与性质的认识，必须将其纳入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期的时空范围之下，置于石堂、石棺等石质葬具的发展序列中去讨论，或可见其特殊性。

部分学者将“宁懋石室”定为祠堂的原因，多从其构造的比较分析、图像题材的选择配置等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目前北魏时期似乎并未发现相同风格确定的石室葬具，且“宁懋石室”与永固陵前祠堂建制相似，应为地面祠堂[2]。依形制而言，北魏平城时代墓内出土类似形制的石堂以为葬具者，其数量并不在少数。尉迟定州墓、宋绍祖墓、云波路M10等均出土有悬山式、带前柱，形制与地面祠堂极其相似的石堂葬具，外侧多设桌案置供物，与东汉时期墓上石堂极为相似。

“宁懋石室”后壁正中呈现空白，未绘制图像，这在发现的北朝石堂葬具中并未见到，与汉代地面祠堂未设“神主”的做法更为相似，因此被认为是判定其性质为墓上祠堂的重要证据之一[3]。但是北魏目前所发现的石堂葬具，其上不绘制图像的亦有不少，且“宁懋石室”作为葬具而言，应承担放置墓主尸身的功能。既有墓主肉体所在以示，不再绘制墓主人像的做法也无可厚非，这与南朝围屏石榻以显墓主“灵

‹1› 邹清泉《图像重组与主题再造——“宁懋”石室再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2期，第97—113页。

‹2› 前揭林圣智《北魏宁懋石室的图像与功能》，第53—54页。

‹3› 前揭林圣智《北魏宁懋石室的图像与功能》，第33—35页。

位”的设置或有异曲同工之妙[1]。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石堂中的确不见“宁懋石室”所呈现的图像主题，且图案描绘手法也大不相同，这应该与北魏平城时期还未进行完全汉化，仍留有鲜卑旧俗有关。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汉化”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促进了一大批石质葬具，包括石棺、石棺床等的出现。因此，就笔者来看，“宁懋石室”应该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据考证，所谓的“东园秘器”即为元谧石棺一类的石质葬具，“东园第一秘器”“东园温明”应该也属于同一类或配套使用的器物。一般此类赐葬需具有极高的身份等级，或与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宁懋”此人，不见于史料，据其墓志也非担当要职，应当不属于赐葬“东园秘器”者[2]，因此，宁懋并没有使用“东园秘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其所使用的石堂在图像表现手法、题材组合上与“东园秘器”均有相似之处，或源于“东园”，或受其影响[3]。

“宁懋”墓志起首对于其本人及世祖有如下记载[4]：

君讳懋字阿念，济阴人也。其先五世属延，秦汉之际，英豪竞起，遂家离邦，遥寓西凉。既至皇魏，佑之遐方□外。父兴，以西域卒陋，心恋本乡，有意东迁，即便还国，居住在恒代，定隆洪业。

由“心恋本乡，有意东迁”可知其家族思想故土、推崇汉地文化之向，而宁懋之妻为荥阳郑氏之后，是汉魏以来的河南大族。由此可见，宁懋及其族人虽非汉裔，却攀附其世祖出自汉地，自称为鲁人，向往中原文化，应当为孝文帝“汉化”政策的推崇者。

“宁懋石室”题记也明确指出，为“孝子弟宁双寿造”，另有榜题“孝子宁万寿”，多次提到“孝子”。此种表述方式无疑是对汉代墓上石堂的一种延续。据其家族在文化取向上的选择，宁懋后人因此为亡兄、亡父出资建造此类石室，意在模仿东汉石堂“孝子之姿”，也是情有可原的。孝堂山东汉郭巨石堂之名已广泛被接受，《水经注》在记述时也称其为孝子之堂，堂内南北朝时期的题记更是如此，可见孝子之名或已与此类石堂对应。

出于宁懋本人及其家族对于汉地文化的推崇，对“孝道”之礼应严格遵循，因此，在使用这一类石堂作为葬具的同时，其上图像也与北魏时期出土的大部分带有鲜卑风格色彩的石堂截然不同，而与“东园秘器”的石棺更为相似，以模仿东汉墓上石堂的图像组合与线刻手法为主。石堂壁面线刻“庖厨”等图像题

‹1› 周庭熙《论南京地区东晋南朝墓出土的明器榻》，《东南文化》2017年第1期，第102－108页。

‹2› 北魏时期，诸王及大臣去世后，上多赐予朝服、钱帛、绢布和蜡等物，以示皇恩，但受赐“东园秘器”者的占比相对较少，主要赐给宗室成员和威望较高的大臣，即身居要职或具有某种特殊身份之人，终北魏一朝仅诏赐36件，是体现受赐者身份与地位的高贵之物。前揭邹清泉《北魏墓室所见孝子画像与“东园”探考》，第18－20页。

‹3› 邹清泉通过对“宁懋石室”图像的考证与“宁懋”墓志的释读，进一步推断“宁懋石室”上的画像可能源出“东园”或深受其影响。前揭邹清泉《北魏墓室所见孝子画像与“东园”探考》，第16－39页。

‹4› 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中原文物》1980年第2期，第33－40页。

材，就是对于东汉文化的一种追溯，而显示出北朝时期石堂少见的特征。

“宁懋石堂”内这一类“孝子图”由墓上建筑可供人参拜而转入地下，成为供墓主或身后世界所用的原因，或与北魏中晚期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孝梯之至，通于神明”的思想观念随《孝经》进入北魏宫廷，而同时又契合了北魏视墓室为墓主神灵归趋之地的墓葬观念[1]。“宁懋石室”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应该就是在北魏平城时代的石堂形制被转入地下后，石堂图像题材进一步被转入地下的代表。

据此，针对其形制结构和图像题材，笔者进一步推测认为：“宁懋石堂”与这一时期流行的以龙虎、升仙、孝子题材为主的石棺，应当属于同一类型墓内葬具。前者虽非“东园秘器”，非皇帝赐葬而用，但应是个人及其家族后人出于某种自身文化取向或要求而做出的选择，可能为特殊定制之物，既不僭越身份、等级，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表达墓主与墓室营建者的情感诉求。与此同时，统治者允许这一类葬具的使用，也可从侧面看到其对于汉文化的支持与崇尚。

东汉时期，墓上建筑开始以石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由此形成了一套以石堂、墓阙、墓垣等为代表的成熟的墓葬地面建筑；并形成完整的发展序列，逐渐与墓室的布局形成统一的整体。经历三国魏晋时期的时局动荡、波诡云谲，至北魏仍存于地表，为后人熟知而借鉴使用。北魏时期，在统治者政策的施行、墓上建筑发展规律的共同作用下，与鲜卑墓祭葬俗相结合，石堂开始承担葬具的功能，出现在墓室之中。兼具葬具与墓祭的双重作用是这一时期墓内石堂的特征。

其后，更完整继承东汉风格的“东园秘器”石棺开始被大量使用，模仿东汉墓上建筑而产生的围屏石棺床也成为时人的选择。以石堂为代表的这一类石质墓内器物，逐渐转变为用以陈设墓主尸身的葬具，成为墓内设置营建的中心，而不再具有明显的墓祭作用。

与此同时，东汉墓上石堂之内的图像题材也进一步被继承与发展。北魏平城时代的墓内石堂在主题的选择上仍逃不开墓上石堂的图像中心组合，即以墓主人画像为中轴线，两侧分布出行、仪仗及狩猎等的组合，并加以鲜卑特有的礼俗风习、绘画技法来表现。虽然传统的四神仙灵、历史故事、孝子列女，甚至庖厨等图像主题似乎并未被设置在石堂之上，但也有部分被表现在墓室壁画之内。洛阳时期“汉化”政策的推行，促使石堂、石棺床等葬具的图像风格与前期截然不同，东汉文化系统中的四神、孝子题材等大量出现，且表现方式、线刻技法明显以汉地风格为中心。而为粟特裔贵族所使用的这一批石棺床，则在图像上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与宗教信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谭浩源）

‹1› 邹清泉《北魏孝子画像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67—70页。